

中原时评

■个论

别让农村养老成为“被遮蔽的角落”

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近日,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在北京大学第八届中国老龄产业高端论坛上,国务院参事马力透露。一项对哈尔滨市的调研表明,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当我们讨论延迟退休时,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世上有很多人根本就不存在退休,遑论延迟退休。他们,就是生活在农村的老人。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退休年龄、退休工资的概念,即使年老体弱,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然需要辛苦劳作。

客观地讲,这些年来,农村老人的生活处境有所改善。相对于过去单纯的“养儿防老”,现在农村老人养老,已经扩展为报道中所称的社会保险养老、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等3个构成,特别是从2009年起,在全国

10%的县试点的新农保,对于农村老人来说是一份“净收入”。但要看到,以每月55元为“起点”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标准太低,很多农村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土地收益极其有限,在生活压力面前“三保叠加”依然一筹莫展。

没有农村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没有农村老人的幸福就没有全面幸福。在现代背景下,并不存在绝对的物价差距,所谓农村生活支出少,那是以降低生活质量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当城里人感慨养老金不够时,对于农村老人来说,这一问题同样存在,甚至更为突出。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城镇居民养老时,不能忽视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

从制度设计上讲,通过加大财政对新农保的净投入,让农民一步跨入幸福生活,可能有点困难。数据显示,全国1.85亿老年人口中,有超过六成以上生活在农村。也就是说,我国农村老年人口超过了1个亿。再小的数字乘以1个亿,都会变得很大。这意味着完全依赖财政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有点不太现实也不可想象。但要看到,现行的以每月55元为“起点”的新农保标准确实

太低,这笔钱买了两盒感冒药后,再买两斤肉都不够。鉴于物价不断上涨,鉴于财政收入不断增强,不断加大农村养老投入事不宜迟。

报道中,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表示,“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次、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这里既涉及财政的直接支持,也涉及相关政策的及时调整。现行的城镇居民养老收入,由“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两部分构成。具体到农村养老,有必要以满足基本生活为标准,让农村老人和城里老人享受同样的政策待遇。针对土地养老问题,现在一些地区农民以土地入股,每年每亩可收入数百元不等。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制度创新,积极推进土地股份合作,让农村老人能从土地中获得更多红利。

农村养老问题亟须引起重视,不能成为“遮蔽的角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具体到养老问题上,农村老人是重点也是难点,但再难也要让农村老人享受到发展成果,让他们均等享受到普惠性的公共福利。

□毛建国

■街谈

控手机,还是“手机控”

15分钟有4人低头看手机,在广东肇庆城区某十字路口有媒体记者日前蹲点留意,在低头族的男女“手机控”中,不少利用等红灯的空隙翻看手机,绿灯亮起时仍有“手机控”盯着手机过斑马线,全然不顾周围的车祸可能发生的危险。而在等红灯时,更常见低头玩手机的司机,在低头“刷微博”看手机或接打电话。(11月11日中国新闻网)

刘震云曾说:“我就觉得手机好像有生命,会控制使用他的人。”而智能手机的出现,仿佛就是为了应验刘震云的这句箴言。马路上、餐桌上,乃至厕所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手机刷新新闻、玩游戏、玩微信。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割舍掉手机娱乐功能的热爱。“充分”利用每一秒业余时间,于“手机控”一族而言变成了充分来玩手机。

但与此同时,危险也在靠近。除新闻中提到的交通事故外,今年4月《新安晚报》也曾报道,一位在高速上驾车的先生,埋头看手机短信,导致车祸发生。而今年10月,成都媒体梳理当地交通事故时,也发现10起交通事故中,因司机耍手机引发交通事故的案列,就占了两成。百度输入“手机控”“交通事故”等关键词,弹出来的案例不胜枚举。

智能手机,虽带给了我们不少新的体验,也带给了我们不少新的束缚。除交通事故外,“手机控”们也正面临被碎片化信息绑架的困境。原本丰富而多彩的业余生活,因智能手机的出现,变得既苍白而又缺乏诗

意。也许过往的闲暇时候,很多人会选择一种悠闲的方式,比如捧一本书,享受一份阅读的安静。但“第四媒体”的时代,梭罗式的“瓦尔登湖”体验,早已替换成了乔布斯式碎片阅读与自娱自乐。

控手机,还是“手机控”,一个并不矛盾的问题,却让不少人难以自拔,甚至疏远了人与人的关系。此前媒体就曾报道,家庭聚会时,老人想和年轻人多说几句话,而年轻人却只顾着玩手机,惹得老人拂袖而去。

所以,不是反对使用手机,而是反对过于迷恋。请把属于走路的时间还给走路,把吃饭的时间还给吃饭,把聚会的时间还给聚会。把投向手机屏幕的目光,投向现实社会。把投向手机的精力,投入现实事业。充分利用时间,并不是充分利用手机。唯有拒绝被手机绑架生活,才能令手机服务于生活,真正享受到科技带给我们的欢乐。

美国人喜欢用电影讲生活哲理,好莱坞拍的科技大片《机械公敌》里,曾描摹了一幅未来的恐怖图景。电影中的2035年,地球上每15人中就拥有一台人工智能机器人,人们通过智能机器人进行生产、设计,甚至是日常生活的一切。然而在未来的某一天,机器人却试图反过来接管人类,因为人类已经变成它们的附属品,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能力。电影诚然夸张,但所揭示出的“用科技还是被科技用”的哲理,却富有深厚的现实穿透力。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专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从来没有一个建筑物像央视新大楼那样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和争议。

我有时甚至猜想,除了几乎每天都能在央视荧屏上看到的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以外,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那条横挂在北京天际线上的“大裤衩”,大概是印象最深刻的建筑物了。

按照世界高层都市建筑学会评委会的说法,作为结构工程学上的杰作,央视大楼是那些希望打破摩天楼既定设计条框的人的一个实体教学课。建筑的设计挑战传统,同时也是对紧密合作和研究并最终达成成果的验证和奖励……如今大家都在追问:“摩天楼是什么?可以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而央视大楼集中回答了此类期待。

而央视大楼主建筑师、来自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的奥雷·舍人则认为,来自美国芝加哥——一个世纪前诞生摩天大楼的国度——的这一奖项是对北京新地标建筑的认可,也是亚洲高层建筑的“一个宣言”。

我的本科生涯毕业于以建筑和结构专业著称的同济大学。作为一个爱好艺术的曾经的工科男,我觉得自己很能理解这份发源自西方专业界的奖状,因为我自己也颇

欣赏这条傲立在800年帝都土地上的充满现代意味的“大裤衩”。我可以肯定地说,西方专业界打量它的目光很单纯:仅仅是从建筑艺术的标准。他们是“局外人”,并不关心它背后隐含的图腾、象征和商业逻辑。

如果仅从建筑学角度而论,央视新大楼扑面而来的现代派风格及其庞大的体量(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体钢结构建筑)足以傲视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同类实验,而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建筑师也许一辈子也碰不到这样的机会。

我在这里也许还需要作一点简单的知识普及,建筑虽是艺术的一个门类,但它与相对更单纯的文学、美术(这里指绘画和雕塑等,有人将建筑也一并归入美术)和音乐不同。建筑艺术的性质更像电影——科技上的挑战以及对材料的运用等“非艺术”的元素,都是构成建筑艺术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好比电影里的声光特技(当今是3D时代)等许多技术应用,本身也是决定和人们评价一部电影好坏的重要指标。

如果在30年前有建筑师画出一张“大裤衩”的设计图纸,一定会被结构工程师

不假思索地否定。因为以当时的建筑材料、施工机械和施工工艺,完成力学结构上如此高难度的挑战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仅凭这一点,“最佳摩天大楼”的称号就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从中国普通公众的眼里看出去,那条尖利突兀的“大裤衩”除了不太符合自己保守传统的审美观外,他们看到的恐怕更多是老外专业人士们不会在乎的那些建筑之外的东西,也就是前文中已经提到的:图腾、象征和商业逻辑……央视新大楼集这些要素于一身,构成了这个时代的重大隐喻。

因此,备受争议的其实主要不在于建筑,而在于建筑之外。我有时还会想,假如“大裤衩”内的不是央视办公机构,而是新浪微博或腾讯微信的办公室,那么它在国人茶余饭后闲聊段子中的命运也许就会截然不同。

当然,这就是现代城市公共建筑注定要承受的命运。作为一种象征着国家力量的“审美对象”,在世俗化的今天,它们具有了像古代欧洲城市里的教堂那样的神圣地位,是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方尖碑”和“祭坛”。

□陈季冰
(作者系知名时评家)

■街谈

规范广场舞需寻求“最大公约数”

广场舞制造的噪声饱受诟病,成为“全国现象”。11月12日上午,广州市人大代表视察流花湖公园、越秀公园,为《广州市公园条例》的立法进行前期调研,《条例》拟规定公园内临近学校、医院、居民楼、机关办公大楼等区域禁止开展喧闹的健身、娱乐活动,预计明年年底前可正式出台。(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A13版)

广场舞引发的“战争”不断升级。由于邻居跳广场舞放音过大影响了自己休息,56岁的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还放出自己饲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11月5日上午,施某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在北京昌平法院受审。事发后,广场再也无人跳舞。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与其让居民愤怒“鸣枪”中止广场舞,不如《条例》规范广场舞,这是基本常识。鉴于此,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广场舞,这个可以有。

广场,既可以歌舞升平,又能够玩陀螺旋圈。而在武汉市江岸区东立国际小区的广场地面上,三天内突然出现了近2000个小洞,不少路过市民觉得奇怪:好好的地面,怎么弄成这样了?保安说:打了洞,那些打陀螺的玩不了,就不能在这里吵人了。都是源于娱乐扰民,“打洞”与“鸣枪”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也都是“很蛮横很暴力”之举,容易激化矛盾,给社会带来不和谐因素。

立法规范广场舞,需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开门立法,让各种意见“舞”起来,让各种音乐“唱”起来。或

许,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舞步”,甚至会“乱成一锅粥”,这也契合社会转型期的特征。社会转型之际,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与纠纷,各个群体间的利益博弈在所难免,每个人都在寻求契合自身利益的“公约数”。而立法贵在兼听则明,在诸多的“公约数”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嘈杂的声音里寻找“和谐调”,让杂乱的脚步统一为“和谐舞步”。

立法的智慧在于平衡好诸多群体的利益诉求,唯如此,才能找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利益最大化。否则,肯定会顾此失彼,甚至滋生矛盾、潜伏危机。因此,“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很多问题并非“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也不是“零和博弈”,关键在于立法者如何掌握“平衡”,在集思广益的前提下寻求“平衡点”,兼顾多方利益。

此外,广场舞要规范,更要扩容。广场是公共资源,从公共资源的属性来看,公共资源一般具备供应的有限性和使用的分散性。这也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广场资源,这些资源是不能“被垄断”的。在公共资源利用上出现扰民行为,一方面源于这种资源的不丰富,另一方面源于公共管理的“不丰满”。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更多的公共投入与财政倾斜,培育更多类型、更多种类的民众公共文化娱乐休闲方式,才是长久之计,才能让公共资源更好地发挥出“公共”的属性,发挥出和谐民生的更大公益作用。

□王旭东